

郑州晚报



联手

精彩节目

探索·发现

先读为快

文图由央视十套 探索·发现 河南省独家提供

本期内容 10月13日央视十套 21:25 播出

2005年8月是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近百位西方耄耋老人携亲带友,从地球的四面八千里迢迢地会聚到中国山东潍坊,参加潍县集中营解放60周年的纪念大会。这次隆重的活动成为一个标志,让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在这里存在了3年之久的潍县集中营逐渐为世人所知。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在山东潍县设立了一所秘密的集中营,关押了大批在中国的西方人士。这个集中营和其他集中营有什么不同?关押在里面的人们如何应对命运的突变?潍县集中营里又发生了什么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潍县集中营

等待希望

当年,中国老百姓把鸡蛋、糖、布鞋等营民们急需的物资用竹竿挑送入高墙内,等待在高墙下的侨民再把钱或衣物抛送出来。

黑市交易在一段时间内成了集中营营民维系生存的通道,可这刚打开的一线希望不久就遭遇到了严峻的局面。也许是听到了风声,6个月后,日军在乐道院墙外三四米的地方围着墙架设了电网,中国百姓要想靠近高墙,就必须先想办法越过这层电网。

这个过程充满了危险,墙外的中国人在越过电网时随时都有触电的可能,墙内的侨民在等待的过程中也随时可能被日本看守发现。暗夜中,黑市交易的过程可以说是惊心动魄。

即便危险随时都可能发生,但生存的渴求支撑起了这条暗夜中的生命通道,在日本人的探照灯下,交易仍在悄悄进行着。而中国的老百姓,为此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西上虞一个年轻小伙子叫韩祥,也上去交易,不小心掉到电网上,被烧成了黑炭。

乔伊回忆道:“于是,营地的人决定不再去和中国人交换食物了,倒不是我们觉得危险,因为即使被逮到,也只是在小黑屋里关几天,而那些帮助我们的中国人实在太危险了。”

失去了黑市交易的物资来源,潍县集中营内的侨民们陷入了极度的饥饿中。既然身陷在战争的囹圄,较量与博弈就要时时展开;既然无法避免命运的安排,那就想尽办法寻求精神的自救。

集中营内的人们来自不同的阶层,从事着不同的职业,他们中很多是颇具才能的音乐家,战争爆发之前,在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的职业乐团中工作。这些具有音乐才能的人们在这里重新组织起来,他们以基督教救世军的一支15人的铜管乐队为主,再凑上业余的大小提琴手,一支临时的管弦乐团诞生了。他们为这个乐团取名为救世军乐队。这支临时乐队穿梭在医院、教堂,给集中营内的人们带来了欢乐。

集中营内还经常组织舞会、戏剧和爵士乐的表演,以及庆祝圣诞节和复活节的活动。他们在自娱自乐中等待着自由的那一天。

潍县集中营中的音乐声几十年后依然停留在亲历者的记忆中,回首往事时,他们宁愿过滤掉那些艰难的日子,而把囚禁岁月中闪着光彩的美好保留在了记忆的深处。

对于当年幼小的詹妮特来说,潍县集中营就是她的全部世界,她在这里学会了写字、算术,带着弟弟玩耍,迎接妹妹的降生,体味着最初的人生冷暖。这是日军的集中营,却也是一个孩子童年的全部记忆。

詹妮特说:“我清楚地记得周围的墙,还记得带刺铁丝网,记得墙外面的中国人想卖给我们食物。我总是想到外面去,与外面的人玩多好。我的世界就是集中营的世界。”

蓬松的土壤里埋着种子,在等待中含着希望,他们尽管是失去自由的囚徒,集中营却是他们自己的集中营,是他们自己的历史和自己的命运。

央视《探索·发现》将于10月12日~16日播出5集专题片——《潍县集中营》。更多精彩请继续关注。



救世军乐队



集中营的日军投降

揭秘山东潍县日军集中营

秘密转移

为更有效地控制在华的同盟国侨民,日军建立了三个大型的集中营,分别在香港、上海龙华、山东潍县。1942年3月到1945年8月,长江以北日本占领区的外侨陆续被集中到潍县集中营,南方各地的美英侨民则集中到上海和香港关押,后期上海关押的外国侨民也多被转移到潍县乐道院集中营。

1943年3月开始,长江以北的同盟国侨民从中国各地被分批押送到潍县。据1944年3月9日的一份调查统计,当时总人数已达1780人,而此后又陆续有侨民被押到一个叫乐道院的地方,也就是潍县集中营。人数最多时达到2250人,其中包括300多名儿童。

说起乐道院的历史要追溯到1881年。这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派牧师狄乐播偕夫人来山东潍县传教,在当地教友的协助下,在老潍县东关外购地建立了由教堂、学堂、诊所组成的乐道院。1902年,美国把清政府“庚子赔款”的白银交由教会在中国办学校,乐道院分到其中一部分。充足的资金使其得到较大改观和 development,成为北美基督教长老会的山东总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和美国《时代》杂志创办人亨利·卢斯都曾随父母居住在此。

1942年年初,日本宪兵队进驻乐道院,所有居住在乐道院里的人员都被驱赶,日军对乐道院进行了大面积改造。

李魁老人今年78岁,由于父亲是乐道院的厨师,他从小生活在这里,直到1942年乐道院被日本宪兵占领。他回忆道:“到了1942年10月底,就看见这墙上有电网了,每天晚上都听到有汽车响。据我一个师范学校的同学说,那是日本的一个运输公司,每天晚上都忙于运华北地区同盟国的侨民。”

1943年年初开始,当地居民在夜晚看到一批又一批西方人被日军带到这里。为了割断集中营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日军对西方人的这次大规模的转移行动进行了周密的安排,由于日军的行动十分秘密,竟使美英及中国情报机构一时未能察觉。

汉奎特神父今年93岁,1938年从比利时来到上海。1942年3月,作为神父的他和同事被集中到山西太原,从那儿被押往潍县集中营。他回忆道:“经过大约两三天的漫长旅程,在3月的一个下午,我们到达集中营。我记得大约是3月17日,我们很吃惊,因为那不是监狱,而是一个长老会传教区,但日本人在六个角都设立了岗楼,架着机枪。”

关押在这里的同盟国侨民,以英国人和美国人居多,还有比利时人、荷兰人、澳大利亚人和其他国家的侨民。曾被关押的英国侨民乔伊说:“日本人把这里糟蹋得一团糟,他们拿走了医院里几乎所有的东西,拿不走的就毁之一旦,几乎所有的窗户都破烂不堪,厕所设备都无法使用,就连许多建筑物也摇摇欲坠。所以当我们到的时候,这里几乎无法让人居住。”

占地160亩的乐道院被划分为日本看守生活区和侨民居住区,这之间是有围墙间隔的。

苦难生活

乐道院中条件相对较好的建筑都被日本人占有,而侨民居住区在经过日本宪兵的洗劫之后已是破烂不堪。

据亲历者回忆,一进大门,是一条布满灰尘的黑煤炭路,称为“大马路”。有家眷的一家人住一小间学生宿舍,单身男女分别集体住教室或会议室的大房间。没有自来水,原始式茅厕,简陋的烘炉,两间有淋浴的房屋,三间大型的公共厨房,一个残破的教堂,一座空无一物的医院组成了这个集中营。

最初大约有1500人就这样被塞进杂乱破烂的房子里。宿舍拥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每张床与床之间相隔不到一尺,毫无隐私可言。这些来自天津、青岛、芝罘(烟台旧称)、北京等地的盟国侨民都是不同的人,他们被混杂在一起,里面有开滦矿务局的局长,原先的薪水非常高,还有黑人乐队等。

这些外国侨民,有的目睹了日军在南京的疯狂大屠杀,有的看到过日军在中国各地的奸淫烧杀,在中国的经历使他们深知日本法西斯的残酷。

在混乱和无序中大家商讨决定,推举出代表,组成一个叫做“自治委员会”的机构,把集中营分成4个组,每个小组选出9名代表,由36人组成教育、综合、工程、营房、医疗、食品供应、财务、雇工、纪律9个委员会,分别负责管理集中营侨民的各项事务,并负责与日本当局进行协调、谈判和不屈不挠的斗争。

月亮门是许多侨民最值得记忆的一部分,月亮门里是自治委员会的办公楼。这个匆忙成立的组织,成了大家的主心骨,其中纪律委员会是和日本人打交道最多的一个委员会。

为了维持大家的生存和这个战时监狱的运转,自治委员会规定除年老体弱者外,人人都必须参加劳动。

在这里,有专长的人充当面包师、鞋匠、修理工、锅炉工以及医护人员,他们对医院进行修复,设计排洪设施,实施旱厕改造;在这里,无论男女,不管是官员、学者、商人还是学生,都得干活,大家轮流帮厨、洗衣、烧火、做煤球、清除垃圾,孩子按时上课,课余时间仍需轮流劳动。

此时,在集中营外遥远的太平洋战场,日本军国主义正在高速的扩张中。1941年年底日军占领香港;1942年,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也先后失守,战争的结束遥遥无期。

每天早晨7时30分的集合点名是集中营永远不变的制度,钟一敲过,所有的人都要到操场集合,分成六队,分别站在固定的点名地点。点查时,每个人都要报上自己的牌号,然后等待值日的日本兵校对名簿。六队相加总数无误,听到钟敲过之后才能散去。这算得上是集中营的头等大事,无论任何事情发生都要进行。



集中营的师生



集中营食堂



集中营解放日照片

“黑市”交易

集中营内有300多个孩子,这些孩子大部分来自烟台芝罘学校和天津的一所教会学校。由于芝罘学校是寄宿学校,当学校师生被迫全部迁移到潍县集中营时,孩子们的父母大多不在身边。想方设法通过信件和父母取得联系成为集中营内的孩子们最大的安慰。

集中营每月只允许写一封不超过150字的信,而且只能寄往日占区或国外。收信虽然没有限制,但邮件在路上用时非常多,因为必须先送到北京审查。即便如此,装满亲情和思念的信件还是穿过纷飞的战火,连接集中营的内外。

在漫无边日的等待中,一丝自由的曙光在1943年9月降临。美日两国磋商决定进行非军事战俘交换。在被囚禁7个月后,经过筛选,243名美国人幸运地踏上了回家的路。

对于仍然留在集中营内的侨民而言,他们只有继续适应着这里的生活。

营里的粮食等主要食品实行配给制,定量少于日占区的中国城镇居民,少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的营养。英国侨民道格拉斯回忆道:“食物很差,我们每人都有个锡罐头盒,我们就拿着这个罐头盒去厨房,他们会给我们一勺用高粱和其他不知什么东西做的粥。”

除了食品短缺和药品的严重匮乏外,随着身体的发育成长,孩子的衣物也极其紧缺。

而中国百姓没有忘记这些外国友人,被营民们称为“黑市”的交易出现了。澳大利亚籍的神父斯甘林,是黑市交易的核心人物。在乐道院围墙的东北处他们发现了一个隐蔽的角落,并与帮助他们的中国人约好在晚上10时以后开始行动。